



# 北上抗日是夺取红军长征胜利的旗帜

■ 蒋建农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人民带来强烈的震撼。中国共产党除第一时间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和劳苦民众“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表达中国共产党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同时也在进一步思考自己的政策。1931年12月5日，张闻天在《红旗周报》第26期发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指出“我们不但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强调，“只有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能对日宣战，才能厉行革命外交，才能打倒帝国主义”。12月11日，毛泽东签署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12月14日，奉命“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26路军，经过其内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在“联合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号下举行宁都起义。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抱病起草《对日战争宣言》，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决心“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它表明，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截然相反，新近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立刻对日宣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捍卫民族利益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侵略步步深入的同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南方是传统的革命中心，那里不仅孕育或发动过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两次护法战争，而且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策源地。但是，叛变国民革命后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政权蒋介石集团，不仅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代表，并且受到江浙财阀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加之，其执政的合法性，还受到世界列强的普遍承认，特别是得到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经济军事力量迅速膨胀，使其逐渐在与新旧军阀的混战中胜出，并于1928年12月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其反动统治日渐巩固。而北方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起，遭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打击，并在北伐战争和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彻底落

败，渐成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由此引发人数超过30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和兵力达10万之众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平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因此，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心北移，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当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

囿于国民党方面疯狂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严密的文化“围剿”，不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强烈的抗日意愿无从实现，而且即使是一次次向全国民众发布的抗日宣言和号召，事实上在苏区以外也只能被少量的受众所知晓。这种状况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处于危急的时刻发生了改变。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团发布政治训令明确：决定从主力红军中派遣一部分为抗日先遣队，以便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证明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与组织者，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全中国群众间的威信与推进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到新的阶段。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从无数次同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绝不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在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瑞金出征之后，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征程。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征程是曲折前进的，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实现北上抗日的探索、对于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的选择，也是逐步深入的。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

化，先后选择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边等地创建新根据地。但是，这些努力一一落空。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系统深入地探寻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长征的道路问题，进而提出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取向。这主要基于：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上述变化，是全面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的结果，是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的最新认识，是对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长征道路的科学展望。

于是，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行动，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最早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合红十军，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南京，第一次在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腹地地区，广泛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二十五军一路高呼“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剿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的口号，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部队；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不久，就收到由红军总部转来的长电，其内容就是瓦窑堡会议精神，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因此成为伴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始终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们不仅沿途宣传，而且在毕节曾组织起贵州抗日救国军，人数达5000人；即使是饱受张国焘错误干扰的红四方面军，其广大指战员与其他各路红军一样抱定北上抗日的共识和民族大义，这是最终战胜张国焘分裂主

义和推动各路红军齐聚西北抗日前线的重要思想基础。红四方面军不仅在其途经和转战的广阔区域深入宣传抗日，而且先后组织起四川抗日义勇军和甘肃抗日救国军。可见，长征不仅是红军将士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万水千山奔赴抗日前线过程，也是他们自觉地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沿途民众共同拯救民族危亡、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计划为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以便与日军直接作战。后经过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和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军事行动，最终赢得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和各路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

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的主力，不仅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奋斗，而且最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号令齐聚西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路红军在不同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局面，把他们纳入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之下，形成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长征中各路红军北上抗日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不仅鼓舞了全体红军将士的斗志，感染和动员了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赢得了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减少了长征的阻力，而且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使中国革命由低谷走向高涨，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作者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以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 何雄伟

### 探索求真

当前，党中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谈到新质生产力时指出：“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紧密联系，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了实践路径和指导方向。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和衡量标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正确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内涵，准确分析江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和存在问题，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潜力，找准突破口，释放新空间，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要补短板。努力提高江西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政府投入水平，拓展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来源，鼓励社会各界增加R&D经费投入，确保R&D支出占GDP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引导企业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投入，合理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多维政策工具，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丰富基础研究机构类型，拓展创新产业链。要强优势。围绕江西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全面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推动江西产业链和创新链联动发展，高水平建设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要借势能。积极搭建研发飞地。积极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科技资源，支持设立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的“科创飞地”，构建与发达地区多元开发合作模式，推动江西科技实力整体提升。争取大院大所、名校名企在江西共建高端研发机构，积极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一批贴近产业发展需求的新型研发机构。

**聚焦数据、生态、文化等生产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生产要素的引入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正逐步成为价值

创造源泉。要积极推动数据与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协同，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以国家“数据要素×”行动和数字江西建设为抓手，立足江西特色产业优势，探索打造“数字江西平台”，率先在电子信息、有色金属、陶瓷、锂电新能源、中药材等行业领域形成一批数据产品和数据品牌。大力推动先进数字技术在企业中的深度应用，加快发展5G、VR、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产业，打造一批5G工厂、智能制造等数字化转型标杆，积极创建国家级“5G+工业互联网”先导区。抢抓元宇宙、新型智能、低空经济新赛道风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集群。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内在要求实现要素配置的绿色优化组合，我省要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依托“生态云”大数据平台，加快健全全省生态产品数据管理、价值监测和结果应用。积极培育生态产品市场，在森林、湿地等领域开展资源资产化、证券化，建立完善生态资本、变财富的市场交易新机制。加强鄱阳湖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合理开发，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我省应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绿色文化

资源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推动文化资源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体育、健康等相关领域融合发展。推进赣鄱文化等发掘阐释，实施赣鄱文化标识打造工程，进一步提升赣鄱文化影响力。整合文化山水资源，构建山水联动、文化融合等全域发展格局，唱响“庐山天下悠”“三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等品牌。充分利用深厚红色文化资源，奋力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合理的资源要素配置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源要素的潜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2023年，江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这说明江西通过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推进全要素生产率跃升方面还有空间。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树立城乡联动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观念，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要统筹安排，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均衡。协同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升要素在城乡、区域、行业间再配置水平，引导资本更多向科技、生态、养老等领域流动。消除地区间、产业间和

企业间资本等要素流动障碍，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有序流动，提高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

**打造高效的体制机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可以作为评判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开展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是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建议我省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考核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的重要目标，列入“十五五”规划。营造人才集聚良好生态。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推动因素。全省要继续强化科教强省、人才强省等重要战略，进行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 and 战略规划，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有效贯通、融合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营造江西识才爱才、敬才重才的良好人才集聚生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为人才提供一流的创新平台和发展环境。打造高效的体制机制环境。要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在体制机制改革、公共服务供给、信息平台公开、企业经营便利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持续优化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

（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企业经济》编辑部副主编、研究员）

## 从红色家书中汲取精神力量

■ 肖笃森



红色家书，是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和平建设时期、内容积极向上的历史文献，是先辈们为我们留下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革命先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对家国情怀的深沉诠释以及对廉洁修身律己的严格自律，是先辈们笔底流出的热血和激情，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自己入党誓言，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员干部肩负着更为艰巨的职责使命，亟待从红色家书中汲取精神养分，补足精神之钙，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植入灵魂，转化为执政为民的强大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从红色家书中汲取信仰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回望百余年奋斗历程，无数中国共产党人遭遇艰难险阻，经历生死考验，但始终奋斗不止，其根源就是因为他们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如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夏明翰在就义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展现了革命先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境界。革命烈士江竹筠狱中托孤，希望孩子“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革命先烈用生命誓言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贞。党员干部要从红色家书中汲取信仰力量，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

颠扑不破的真理，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始终保持理论清醒和政治坚定，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从红色家书中传承革命精神，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刘少奇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应该躲避党和人民的监督”。这种自觉接受监督的自律意识和自我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邓颖超在致信养女孙维世时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艰难困苦考验”。这种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保障。陈唐在信中告诉孩子“我们最关心你们的是不是在各方面都很刻苦地锻炼和严格地要求自己”，道出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谢觉哉在给子女的信中教导他们不贪便宜、不图享受，将党性要求转化为

具体的生活规范和慎微的修养原则。党员干部应从红色家书中感悟廉洁自律的政治操守，弘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永葆斗争精神，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从红色家书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厚植为民情怀。**吴玉章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依靠党，相信群众，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这种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价值取向是为民情怀的集中体现。何叔衡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党员干部应从红色家书中深刻认识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实现人生价值。

**从红色家书中读懂家国情怀，进一步建设良好家风。**红色家书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将“小家”融入“大家”、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起来的深沉家国情怀。对党员干部而言，这种情怀既是政治品格的重要内核，也是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党员干部要从红色家书中汲取家国情怀的精神养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保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格局，摒弃“打小算盘”“谋小圈子”的狭隘思维。革命先辈对家人的要求往往十分严格，尤其强调勤俭持家、清廉传家，这与当前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重要要求高度契合。党员干部要以红色家书为镜，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育清廉齐家的良好家风，坚决杜绝特权思想，筑牢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组织部部长）